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山东人民的暴动和起义

山东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时期

山东人民的暴动和起义

山东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七月

责任编辑：展洪俊 孙东升 李 海

封面设计：刘书军

山东人民的暴动和起义

山东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济南陆军学校印刷厂

850×1168 大32开本 字数 325 千字

印数 1—1500

出版说明

本书汇编的山东人民在二战时期、抗战时期的二十六个暴动和起义的专题调查报告,是各军分区、警备区分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同志在地方党史征集部门的大力协助下,通过走访当事人、查对史料、現地调查等,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后整理出来的,其主要史实、情节基本准确。根据山东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和政治部首长的指示,现将这些专题调查报告汇编成书,供部队、民兵进行传统教育和有关部门的党史研究参考。

本书是一部带有资料性质的革命历史传统教育参考书,除收有各军分区政治部纂写的综合调查报告外,还摘录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档案资料,证明及旁证材料做为附件,并提供部分资料(这些资料多数都是本书各专题调查报告的依据)索引。同时,为使读者能从整体上系统地了解暴动和起义发起的原因、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成功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我们还对两个时期的暴动、起义分别写了“概述”。

由于暴动和起义的事件年久日长,原始材料不足,又限于编者的水平,难免有粗忽遗漏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本文的调查编写,得到山东省各级党史征集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协助,直接参加调查和编写工作的同志,付出了艰苦劳动。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山东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

一九八七年八月

目 录

上 编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人民的暴动

概述.....	(1)
陵县暴动.....	(10)
坡里暴动.....	(25)
高唐农民自卫团暴动.....	(42)
饮马暴动.....	(58)
博兴“八四”暴动.....	(67)
益都暴动.....	(87)
东明盐民暴动.....	(102)
日照暴动.....	(114)
鄒马、苍山暴动.....	(134)
沂水暴动.....	(151)
龙须固暴动.....	(160)
胶东“一一四”暴动.....	(173)

下 编

抗日战争时期山东人民的武装起义

概述·····	(184)
冀鲁边起义·····	(192)
鲁西北起义·····	(220)
珍珠山起义·····	(232)
天福山起义·····	(239)
黑铁山起义·····	(247)
牛头镇起义·····	(264)
潍北起义·····	(275)
徂莱山起义·····	(296)
泰西起义·····	(312)
公家疃起义·····	(334)
苏鲁边起义·····	(343)
邹坞暴动·····	(359)
湖西起义·····	(374)
张寨起义·····	(387)

概 述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山东党组织依据中央的指导方针，在全省各地组织发动了多次农民暴动，比较著名的有十二起。这些暴动的兴起，是当时黑暗衰败的政治经济形势给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所逼出来的。在暴动斗争中，有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但由于领导思想的错误，致使暴动归于失败。暴动的经验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做为武装斗争的尝试，意义是非常深远的。

一、暴动的政治经济背景

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山东处于新旧军阀冲突，明争暗夺，政局混乱的局面。张宗昌统治山东时期，宣布山东独立，以“保境安民”为幌子，日夜戒严检查，镇压爱国行动，以图维持山东残破不堪的局面，使得各界人士和工农群众心神不宁，惶惶不可终日。韩复榘入鲁后，与沈鸿烈、刘珍年割据山东，形成三军阀鼎足的局势。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进攻热河，威逼平津时，韩刘两军阀加剧了内哄外咬，争夺地盘、屠杀群众、拉夫派饷、扩捐增税、劫掠民财，比张宗昌的统治更加残酷。地主豪绅也趁火打劫，乱拉武装，欺压百姓，盘剥人民。劳苦大众在军阀豪绅的涂炭下，呼天号地，苦苦熬煎，渴盼救星。

山东的经济形势日益恶化。在农村，除了军阀混战的破坏和战火的涂炭外，主要是地主劣绅、土匪、恶霸对农民的高利盘剥、巧取豪夺、侵吞霸占，摧毁了稳定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和小康生活，迫使劳苦群众颠沛流离，乞讨觅生。加之大部地区遭受水灾、旱灾、蝗灾和病灾的严重危害，地无颗粒，病无药医。人

民群众饥寒交迫，遍地呻吟，怨声载道，民变蜂起。工商业受战乱和外商入侵地冲击破坏，陷入衰退和崩溃中。军阀乱发纸币，通货膨胀。外商、特别是日商横行，滥施特权，日货大量涌入市场，包括吗啡白面和枪械生意，亦可不受检查，成了他们的专利。致使我工业生产不振，工厂纷纷倒闭，工人失业潦倒，无法求生。商业萧条，难于经营，店铺歇业，流通不畅。有的商人把货物隐藏起来，有的城市受到断粮的威胁。城镇居民朝不保夕，担惊受怕，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山东党组织是全国最早建立起来的党组织之一。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员被杀害，党的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一九二七年十月，成立了中共山东省执行委员会，领导全省一千五百多名党员，在城市和乡村开展革命活动。同年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指出：要急速进行武装的工作，必须有充分的武力后备，组织才可安全保存。这是当时各个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内容。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各级组织注重了党的发展，不断扩大党的力量，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为武装暴动创造条件。同时，还加强了城市的工运工作，广泛开展了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党的影响越来越大，人民群众日益觉醒。

二、暴动的概略情况

一九二七年十月新的山东省委成立后，积极贯彻了中央关于举行武装暴动的指导思想。省委政治形势宣传大纲中对形势的估计是：“目前时局是整个的统治阶级动摇、冲突、崩坏、无能力维持他的统治。目前的工农是到处暴动、斗争，要求推翻现在的统治阶级”。省委就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指示各个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暴动。尽管有些地方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暴动的条件，也在省委特别是省委军委委员张鸿礼的强行要求和催逼下行动起来。因此，山东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

起的十二次较为著名的暴动，除东明的盐民暴动外，其他十一次都失败了。许多暴动的领导人、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暴动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或于暴动失败后遭到敌人的逮捕和杀害，使革命事业蒙受了惨重损失。各地暴动的概况是：

山东党组织领导发动的最早的一次暴动是陵县暴动。在鲁北县委的统一领导下，成立了陵、德农民暴动党支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党支部组织发动了五六百人齐聚陵县城下，准备攻城。因为先日潜入城内的暴动总指挥于佐舟被其在官府任职的叔父察觉而看押，送不出攻城信号，失去了指挥，暴动群众即行解散。参加暴动的共产党员于事后被逮捕镇压，暴动失败。

在鲁西县委领导下，一九二八年一月十四日暴发了阳谷县坡里暴动。由韩建德、聂子正率领暴动队伍攻占了坡里的德国教堂，缴长短枪四十余支、子弹两万余发、银元两万七千元、粮食不计其数。随后，又组成由韩建德任总司令，聂子正任政治委员的五百多人的起义军，消灭了敌民团武装，袭击了阳谷县警备队，又与军阀张宗昌派来镇压暴动的部队激战数日，终因寡不敌众，被迫分散突围。坚持了二十五天的暴动归于失败。

在鲁北特委的领导下，高唐县谷官屯农民自卫团准备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举行暴动。特委书记李春荣、团长（特委委员）金谷兰率领自卫团在暴动前先镇压了当地部分土豪劣绅，制定了暴动方案，绣制了党旗，准备于五月四日率千余人的自卫团队伍攻占高唐县城。但因密泄露，县警备队长李长兴伙同土匪头子李彩题率近千名军警和土匪于五月四日凌晨袭击了自卫团驻地，经激烈战斗，李春荣和十几名共产党员壮烈牺牲，金谷兰带少数人突围出去，暴动随之失败。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省委派员于培绪组织发动了饮马暴动。这年十月于主持组建了饮马党支部，组织领导了反土豪

斗争。为此，军阀张宗昌令王路全率兵前往镇压。饮马支部获此消息后，即决定暴动，联合各村红枪会员（即经党组织教育改造的农民武装）一千余人，在饮马严阵以待。王部见暴动队伍人多势众，便用“讲和”的欺骗手法赚开围子北门，混进村中。暴动队伍以为没事了，邻村的红枪会员也撤走了。王路全假惶惶地带兵撤走，走出不远杀了回马枪，逮捕杀害了暴动的领导和骨干分子，致使暴动失败。

一九三二年八月四日，在博兴县委书记张仿和县委军事部长马千里领导下，于高渡村和兴福村分两路发起暴动。暴动队伍消灭了反动联庄会和民团，捣毁区公所，缴枪一百多支，子弹数千发，战马十余匹。并举起“鲁东革命军第一支队”的红旗。两天后，暴动队伍发展到六七百人，长短枪百余支。但是，当韩复榘派出近千人的部队来镇压时，执掌暴动队伍领导大权的省委军委委员张鸿礼惊慌失措，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便决定解散暴动队伍，分头隐蔽，致使暴动失败。

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七日，益都郑田区委根据县委的暴动计划，在区委书记冀虎臣和各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下，举行了益都暴动。暴动队伍分十余路同时袭击各村的民团武装，因缺乏组织指挥只有三路行动较顺，夺枪后拉到集结地点仅三十人左右。当时与县委联系不上，周围村庄都已戒严，冀虎臣被迫宣布队伍解散，暴动仅两天即告失败。随后，冀虎臣与县委书记郑心亭等被敌人杀害。

一九三二年农历七月二十八日，在濮阳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发动东明县盐民举行了争取经济权力的暴动。当时盐民反抗盐巡的残酷压迫和盐税重负的斗争很尖锐。县委抓住这一特点，先后派俞屏、支心坡等多人，做盐民领袖支悦刚的工作，让他组织东明盐民协会，进行抗税斗争。不久，支悦刚召开了东明盐民协会成立大会，并于次日率一千多会员冲进县城，提出“盐巡退出东

明，除消盐税，准许盐民做盐”等要求。县长见盐民人多势大，迫于无奈答应了盐民的要求，取得了经济斗争的胜利。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三日晚，日照县委书记安哲、组织委员牟春霆领导发动了日照暴动。暴动队伍七百余分南北两路行动，缴了地主的枪支，烧毁地契文书，并通过内线关系攻破有二百多民团武装守卫的五家滩镇。反动政府惊恐万状，韩复榘急令八十一师调兵镇压，使暴动队伍陷于重重包围。激战中暴动队伍弹尽粮绝，许多人受伤牺牲。最后被迫疏散隐蔽，暴动失败。

一九三二年六月至三三年七月，临郯县委先后发动了郯马、苍山暴动。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临郯县委书记刘之言等起草了“郯马暴动”计划、宣言，准备举事。后因怀疑有人泄密而做罢。组织樊家堰暴动时，又因负责人到三捷庄组织武装的途中被捕而致使暴动流产。一九三三年七月六日，刘之言等人从郯马转移到苍山，准备打出“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总队”的旗号，再次暴动。又因事前泄密，暴动仓促举行，拉起二百余人的队伍，枪毙了恶霸地主，缴了几十支步枪，并击退了地主武装的几次反扑。七月九日，国民党八十一师的一个旅进攻暴动队伍，因敌我力量悬殊，暴动队伍最终被打散，暴动失败。

一九三三年五月三十日，沂水县委领导发动了在山东的暴动中持续时间最长的沂水暴动。暴动队伍攻打反动联庄训练处和国民党八十一师的一部，杀死警察、联庄会员等几十人。国民党派兵镇压时，暴动队伍又带领众多群众在宝泉山、黄石山与敌战斗。后来，敌人调来重炮、重机枪等武器，残酷屠杀暴动队员和群众三千余人，造成骇人听闻的黄石山惨案。之后，暴动队伍又集合一百五十余人开进沂山，面对敌人的疯狂围剿坚持游击斗争三个多月，后来因党组织被破坏、失去领导，致使坚持了五个多月的暴动终于失败。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六日，新泰县委成员李银彬、崔全法率一

百多人的队伍在新泰蒙阴边境的龙须崮举行暴动。他们先后袭击了蒙阴的张庄镇和坡里镇，收缴枪支，开仓分粮。反动政府惊恐万状，派出大队人马镇压。部分暴动队伍转移到鲁山，与敌展开血战，弹药打尽后解散隐蔽，使暴动失败。

一九三五年农历十一月四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荣（城）等县发动了“一一四”暴动。暴动指挥部设在昆嵛山，由特委书记张连珠任总指挥，队伍番号是“中国工农红军胶东游击队”。暴动队伍分东西两路行动，连续进攻反动政权和地主武装，破坏敌人的交通要道和通讯设施，开仓济民，宣传党的主张。反动政府派国民党八十一师分两路直扑暴动队伍，进行镇压。经激烈战斗，张连珠及几百名共产党员和暴动队员惨遭杀害，暴动归于失败。

三、暴动的经验教训及其意义

山东是最早创建共产党组织的省份之一，党的组织基础比较牢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山东党组织遵照中央的统一号令，迅速转向开展武装斗争，在全省各地接连发动了多次农民武装暴动。这些暴动震撼了反动政权，打击了地主豪绅，壮大了党的声威，锻炼了人民群众，意义是巨大的。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左倾路线的指导，山东党组织对斗争形势缺乏客观的分析认识，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对武装暴动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也不足，加之战斗指挥上的错误等等，致使暴动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最终却归于失败。经验教训是深刻的、惨痛的。

一、党中央左倾路线的指导，山东省委盲目地执行中央的错误方针，是暴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党中央召开了“八七”会议。会上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但没有注意被掩盖着的左倾思想。同年十月，“左”倾机会主义第一次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瞿秋白主持的中央临时

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指出：“……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形成尽可能的大范围的农民总暴动；……进一步而达到在较大的范围内夺取政权。”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彻底解决民权主义而急转直下地进入社会主义道路。大革命失败后革命不是处于低潮，而是不断高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上犯了错误，特别是对革命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的估价上盲目乐观。在这种思想观念支配下，盲目地指示全党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暴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令各地有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开始领导农民夺取张宗昌军警的武装斗争，……。在这些暴动中实行没收地主的土地，杀官吏，杀豪绅、杀地主。”同年十二月十三日，省委给寿光县委的指示信中批评他们机会主义、走入歧途，改良式，强烈要求县委宣传土地革命、夺取政权，煽动农民暴动。与此同时，省委对陵县、坡里、饮马和谷官屯农民武装暴动也作了同样的指示和要求。各地党组织在省委盲目执行中央“左”倾路线的指导下，不顾本地区反动势力暂时强大，党的力量不足，对群众宣传、组织都很不够的实际情况，盲目举行暴动。一九二八年六月，党的六大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党对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逐渐走上正轨。但是，到了一九三〇年，党内的“左”倾思潮有了新的泛滥，比瞿秋白的“左”倾盲动有过之而无不及。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提出了“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了”和“暴动、暴动、再暴动”的极左口号。一九三一年，以王明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又占据了党的统治地位，在全党上下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更有理论、形态更加完备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夸大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自身危机，强调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和党在全国的进攻路线，认为新的革命运动的高潮日益增

长实在是不可争辩的事实。这一极其错误的思想路线，在党内维持了五年之久，给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害。山东党组织在这条“左”倾路线的指导和影响下，错误地认为发动游击战争、创建苏区革命根据地和北方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不是根据客观事实而是凭主观热情设想了省内十县陆续发起以武装摧毁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的农民暴动，以形成北方革命的新高潮。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次暴动统统归于失败，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革命力量几乎全部丧失。

2、缺乏组织领导和指挥武装斗争的经验，暴动队伍的组织纪律性不严、指挥不灵，暴动经不起敌人的反击。当时暴动的组织指挥人员绝大多数是普通中学出身的学生和有点活动能力的农民及少数旧军人，不懂军事，更缺乏领导农民武装斗争的经验，对暴动队伍没有进行起码的军事常识教育和训练，暴动人员军事素质很差，纪律松弛。加之领导上计划不周，出现泄密，以及仓促上阵、错误指令、受骗上当等失误，使暴动队伍蒙受许多惨痛损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如：郯马、苍山暴动先是领导人去集合队伍暴露了身份，后是被迫仓促上阵，两股起事的队伍还未及统一行动，就被敌人镇压下去；谷官屯暴动酝酿日久，却在暴动前因泄密遭敌偷袭，红旗还未举起就被扼杀；饮马暴动的领导明知敌兵前来镇压，却轻信敌花言巧语放其入营，结果惨遭血洗；博兴“八四”暴动的领导意志软弱，仅仅闻讯敌军要来攻打，就下令解散，使暴动队伍不战自溃；益都暴动的领导指令不明，使不少党员干部把夺枪误解为囊中取物，竟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率众到敌区公所拿枪，结果遭到迎头痛击。上述事实说明，“二战”时期的暴动除战略上受“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指导外，因战术方面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和惨败也不可低估。

三、没有坚持广泛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这个基本方针。暴动队伍在起事前很少考虑攻防、进退、回旋

余地、设法生存等问题，幼稚地认为一旦举事便能在短期内推翻反动统治者，立稳脚跟，而忽视对敌人强点和弱点的分析选择，忽视对群众的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对暴动的主张、意义似知非知，不能够同暴动队伍心心相印，水乳交融，在紧要关头暴动队伍得不到群众的信任和大力支持。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忽视，致使暴动队伍在行动上往往不是把队伍拉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偏远地区，攻击其弱点，并借以深入广泛地发动群众，壮大队伍，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而是去攻打敌人有重兵把守的县城和乡镇，或者在敌军镇压时占据某个山头与敌硬拚，造成寡不敌众的局面。如陵县、沂水、日照，龙须崮和胶东“一一四”等暴动，大都是事到临头才发现面对之敌如此强大，不得不慌慌忙忙地改变计划，乱了自己的阵脚；有的攻打县城和乡镇久攻不下，反使自身伤亡惨重；还有的面对数倍于我的兵力，死守阵地直至被打散，这种不分析主客观情况、以弱攻强、脱离群众的孤军作战的战法，给暴动的结局增添了浓重的悲剧色彩。

“二次”革命战争时期此起彼伏、轰轰烈烈的农民暴动，除东明盐民暴动在经济利益斗争上取得了胜利外，其余十一次全部失败了。但是，作为武装斗争形式推翻反动统治阶级的伟大尝试，其意义是深远的。这些在党组织领导下的农民，挣脱了地主豪绅奴役、剥削的枷锁，昂首挺胸地拿起武器，英勇地投入了与反动军警搏斗的战场。充分显示了觉醒的人民不畏艰险、敢于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巨大潜力，同时还强烈震撼了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狠狠打击了土豪劣绅，动摇了封建、官僚的基础，扩大了党的影响，锻炼了党和群众，积累了武装斗争的经验，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李 海

一九八七年三月

关于陵县农民暴动的调查报告

德州军分区政治部

大革命失败后，根据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精神，在中共山东省委指示下，鲁北县委决定领导发动陵县农民暴动。经过反复酝酿和准备，制定了暴动计划，印发了暴动宣言、口号和标语，城内打入了暴动接应人员，部分暴动区域的民众也已采取了烧毁地主场院的行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四五百名群众在城北天齐庙集合，准备以里应外合的方式攻占县城，实现陵县武装暴动。但因条件不成熟，暴动失败，给陵县人民留下了深刻教训。

暴动的社会背景

二十年代的陵县，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缩影，政治黑暗，经济凋敝，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一九二五年张宗昌祸鲁，劳动人民苦难更加深重。赋税猛增。县志记载，一九二六年在每两丁银的基础上加征到四点八五元，一九二七年即增到十八点五四元，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军事善后捐、讨赤捐、住房捐、牛、狗、猪捐不下五六十种。有关县志对此写到：大军云集，供应浩繁，垫支给养等费六十万元之巨，积欠商民借款至七万余元，罗掘俱穷，枯竭已极。而败兵过境，烧杀掠夺，似匪如贼，民人十室九空，散兵游勇在境内化为土匪，境内成了土匪天下，土匪一次在土桥街抢“肉票”三十多人，杀二十多人。更有甚者，德临道道尹林介钰（陵县属德临

道)借口剿匪,到土匪驻地虚放几枪,丢下枪弹任土匪收敛,事后土匪再将枪弹送交林介珪。土匪有了官府支持,公然树起“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钱,只许爷不要,不许你不还”的大旗。自然灾害频之发生。一九二七年大旱、早霜,陵县受灾人数达十万以上,人民在走投无路情况下,反抗斗争屡有发生。一九二六年秋,红枪会四万余人向军队围攻,张遂调大军包围屠杀,屠杀三十六村,因此德州一带农民对张宗昌非常痛恨。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矛盾重重,危机四伏。共产党撒在陵县的火种,给陵县人民带来光明和希望。一九二七年夏,德县宋集支部(今属陵县)成立,党员及活跃分子八十多人,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协会,周围几十个村和宋集农协联系,死气沉沉的农村一时活跃起来。

党组织对陵县暴动的领导

山东省委对陵县局势的发展非常重视,对陵县发生的红枪会与驻军的冲突所表现出来的农民革命热情予以了肯定。一九二六年秋,省委将刚从广州农讲所受训回来的共产党员于佐舟派回家乡任陵县农运特派员,领导陵县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山东省委分析了军阀混战及五十六个县遭受自然灾害的形势后,要求各地有党组织的地方,立即开始领导农民夺取张宗昌军警的武装,尤其是要集中力量在几个已经暴动的地方,实行没收地主土地的斗争。在山东省委的指令下,鲁北县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做出《陵县暴动计划》上报省委,事隔三日,省委就对陵县暴动计划作出批复,对暴动应注意的事项作了明确指示。同时,鲁北县委在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成立了鲁北行动委员会,领导鲁北八县、即平原、德县、夏津、禹城、陵县、高唐、临邑、商河的农民暴动。对于陵县农民暴动,鲁北县委尤为重视,加强了领导: